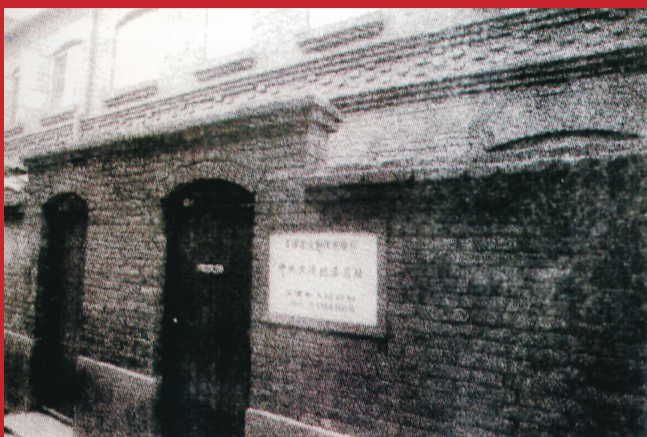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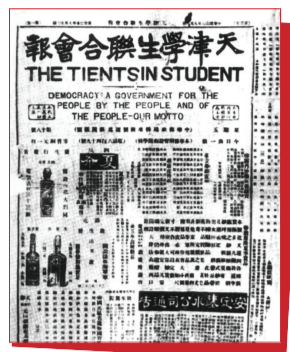
■中共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旧址



天津党史红色名片

编者按

2024年是中共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100周年。百年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天津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奋进新时代新征程,留下了光辉的奋斗足迹,取得了辉煌的历史成就,熔铸了鲜明的红色精神。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的重要论述精神,本报今起陆续刊发中共天津市委党史(中共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组织撰写的“天津党史红色名片”系列文章,宣传普及党史知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天津篇章。



五四时期出版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

觉醒

——与工人运动相结合

在学习、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天津先进知识分子深刻认识到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和强大力量,他们积极深入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天津广泛而深入地传播,也为中共天津地方组织的建立奠定了比较好的基础。

作为马克思主义与工农运动紧密结合的主要地区之一,五四运动以来,周恩来、张太雷和于方舟等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理论只有被广大人民群众掌握,才能真正成为改造世界的强大力量,他们特别注重舆论宣传与工人实际斗争相结合。李大钊和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其他成员多次来津指导工作,帮助开展工人运动。众多进步青年走向社会开办平民夜校、工人补习学校等,并深入到塘沽工人区和天津郊县等地开展工农教育。1920年8月,觉悟社邀集北京少年中国学会等四个团体在陶然亭举行座谈会,听取李大钊关于知识分子深入工农开展革命运动的主张,决定成立名为“改造联合”的组织,宣布“本联合各地革新团体,本分工互助的精神,以实行社会改造”,并提出“到民间去”的口号。这一口号的提出,对于促成工人运动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结合,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加速了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进程。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马克思主义与天津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重要举措之一就是天津工余补习学校的建立。1921年9月11日,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天津法政专门学校教员于德、安体诚等创办了天津第一所工人学校——天津工余补习学校。学校以普及工农教育和促进其思想觉悟为宗旨,在推动天津工人运动开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补习学校存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培养了一大批开展工人运动的骨干力量,与补习学校发生联系的工人不下数百人。此后,各种平民学校应运而生,至1924年,天津平民学校已经发展到30多所。

1922年7月,为加强对天津工人运动的领导,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指定安幸生和李培良为天津特派员,建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天津支部。天津支部联合其他团体,积极开展维护工人权益的劳动立法运动。在其影响下,京奉铁路工会天津分会成立,天津印刷工会得到巩固和发展,在天津形成一支开展工人运动的主力军。天津工人和各界群众积极声援并以实际行动援助长辛店工人政治大罢工,随后又发起为开滦矿工捐款运动,使罢工持续20天之久,充分彰显了工人阶级团结互助的伟大力量,同时也表明马克思主义在天津的传播进入到运用理论指导革命的阶段。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同天津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国共产党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于1924年9月正式建立,马克思主义终于在天津开花结果。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强调:“在人类思想史上,没有一种思想理论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人类产生了如此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天津早期共产主义先驱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火种”播撒到津沽大地,集聚并培育了一大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为天津党团组织的成立创造了条件,在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实践中,展现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实践伟力。

作者系中共天津市委党校(中共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地方党史研究处四级调研员、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天津

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地之一

孟孟

推动着天津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走向深入。

呐喊

——报刊媒介的发声

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在天津的广泛传播。《新青年》率先开辟马克思主义研究专栏,专门研究马克思列宁的著作文章,受到天津先进知识分子的欢迎。与此同时,天津地区反映社会新思潮的报刊文章也如雨春笋般出现,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逐步由知识分子向社会扩散开来。

1919年5月6日南开学校创办的《南开日刊》,以鲜明的反帝爱国特色在天津知识界和青年学生中产生一定影响,先后刊发《思想革命》等大量文章,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周恩来主编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宣传反帝反封建新思想,强烈抨击封建礼教,提倡科学、民主和改革,号召青年及各界群众与旧势力做坚决的斗争。觉悟社社刊——《觉悟》,着重研究各种新思潮,讨论现实问题和社会改造问题,《觉悟》的出版对促进人们解放思想、打破精神桎梏、勇于追求真理,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新生社创办《新生》杂志,主张新思想和社会主义,这一刊物在五四运动中为团结天津进步青年、传播真理、开展爱国斗争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北洋大学的《北洋日刊》,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醒世周刊》,也都发表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与俄国十月革命相关文章的文章。这些报刊作为当时天津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进步刊物,对促进天津先进知识分子认识、了解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发挥了积极作用。

1920年10月,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团组织面向进步青年发售《共产党》和《共产党宣言》,并把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印成小册子,在天津先进知识分子中发行,马克思主义在天津的传播进入新的阶段。在这一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大量增加,《晨报》《明日》《女星》等十多种报刊,先后发表了近百篇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文章。这些文章关于马克思主义原著的介绍,在内容上已由对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一般介绍,深入到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思想、历史、法律、社会等诸多方面的论述。

就在这一时期,一些官方报纸也加入了宣传的热潮,从1921年3月到1922年5月,《益世报》相继发表周恩来54篇、近20万字的旅欧通讯,这些文章介绍了对欧洲各国工人运动状况,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进行了积极的宣传。天津《新民意报》副刊《星火》曾转载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社会主义下的经济组织》

《史学与哲学》三篇文章,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做了比较全面的介绍。报刊和文章的增多使马克思主义在天津进入更多人的视野,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天津的早期传播进程。

阵地

——进步团体的建立和活动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天津先进知识分子迅速成长起来。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改造中国社会的强烈愿望,如火如荼的反帝爱国运动,促使天津逐渐产生众多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妇女、劳工团体,这些进步社团的产生及活动,为马克思主义在天津的早期传播提供了推力,为天津党组织和革命事业准备了人才。

五四运动爆发后,天津青年学生立即成立“天津学生联合会”,这是天津在五四运动中成立的第一个学生爱国组织。大批学生走向街头进行爱国演讲,通过游行示威等行动积极发声。在爱国学生的影响下,天津工人和各界群众也积极投入到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中,通过成立工人群众组织和救国团体,天津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不断高涨。1919年6月24日,五四运动中全国成立最早的各界群众反帝爱国团体——天津各界联合会正式成立,成员除了学、商、教、绅界外,还包括妇女界、新闻界和宗教学界。这个组织不仅在天津爱国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对推动各地以及全国各界联合会的成立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由于受到封建思想的束缚,天津最初成立的爱国团体组织具有男性成员,为此,专门组织领导天津妇女爱国团体——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应运而生。她们以实际行动积极践行强烈的爱国情感,通过组织演讲向妇女宣传爱国思想;通过出版《醒世》(周刊),作为天津进步女性发表言论的重要阵地,发表有关主张妇女解放、男女平等方面的文章,唤醒天津妇女的爱国意识,促进深受封建思想束缚的女性的思想解放。

由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女界爱国同志会的骨干组成的革命青年团体觉悟社,在成立之初便邀请了李大钊到社演讲,李大钊勉励社员要探索革命真理,为改造中国而奋斗,并称赞“觉悟社是男女平等、社交公开的先行”。这次活动后,觉悟社社员积极阅读李大钊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对比推求中,觉悟社社员逐步超越和抛弃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辨别和确定了改造中国社会的方向 and 道路。觉悟社成立不久,另一个革命青年团体新生社在于方舟、韩麟符等领导下成立,成员大部分来自直隶省立第一中学校和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其创办的《新生》杂志,首次提出

在天津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这一刊物也被誉为“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革命刊物。

1920年10月,根据李大钊指示,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青年团以研究和实现社会主义为宗旨,通过出版《劳报》等“文献读物”,深入天津社会,将工人、农民、学生、士兵组织起来,积极开展宣传教育和调查发动工人群众的工作。创办“五五书报代卖社”,向天津人民介绍了大量的“文化和科学的书籍”,在宣传文化、输入科学、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起到了极为重要的媒介作用,在天津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与大众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1922年年底,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公开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又称马氏学会),出版《明日》旬刊,并创办“马氏通信图书馆”,用通信的办法,向有志于革命的爱国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团结更多的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改造社会。

中坚

——先进知识分子的推动

五四运动后,天津先进知识分子在反复思考比较中,逐步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为天津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工人运动和妇女解放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

天津先进知识分子在斗争实践中明确认识到,只有抛弃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目标和社会主义改良的幻想,才能从爱国主义者成长为共产主义者。《新生命》第二号发表的《评现代女子觉悟之不彻底》一文指出:“彻底的觉悟一定要在推翻现在社会组织上边着想”,而不能“仍用几千年来补东补西的老套子来改革”,表明了作者鲜明的革命立场。《南开日刊》在停刊纪念号上发表了题为《今后中国劳动家应当怎样去做?》的文章,指出:“百年大计,还得吾辈劳动家奋起起来,扑灭了资本家大地主同他们的仗腰杆子的专横强权不人道的物,直接行动,改造社会,所有各种困难问题,就可以全解决了。”《南开校风》第131期发表的《社会主义与中国》明确指出:“农工阶级起来革命走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人民的幸福,是我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我坚信消灭剥削制度,实行按劳分配,给全体人民以共同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一定会实现。”此时,赴法勤工俭学的周恩来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以及欧洲各国的实地考察,最终确立共产主义信念,他的通信及为《益世报》撰写的通讯,对其他觉悟社成员和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产生了积极的推动。

于方舟、安幸生、邓颖超等天津地区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先驱们,围绕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学习、宣传,运用马克思主义反帝爱国思想,

“书痴”钱惟演 爱书遮百丑

晏默存

钱惟演,吴越王钱俶之子,随父纳土归宋后,历任直秘阁、知制诰、翰林学士、太子宾客、工部尚书等,官至枢密使。

钱惟演聪明好学,才华卓绝。有一次,宋真宗召集朝会,临时安排钱惟演起草诏令,他当即在朝笏上起草,迅即而就,而且文理俱佳,让宋真宗以及满朝文武赞不绝口。

钱惟演像当时许多有才华的士大夫一样,把“致君尧舜上”作为自己的毕生理想,希望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为此,不断攀附权贵。丁谓任宰相,他与丁谓联姻;丁谓失势,他转身趋附寇准;刘太后“垂帘听政”,他想方设法与刘太后攀亲。尽管他后来的确权倾一时,但他攀龙附凤、朝秦暮楚的品格,颇为时论所鄙薄。在士大夫间声誉不佳。

不过,这样一个口碑甚差的人,却有一个让士大夫非常钦佩的爱好,那就是爱读书、爱藏书、爱编书、爱写书,近乎痴狂。《宋史·钱惟演传》记载他“于书无所不读,家储书籍侔秘府。尤其奖厉后进”,高度概括了他的三个特点。

“于书无所不读”,说明他涉猎书籍之多,阅读范围之广,非一般士大夫仅为一纸进士“文凭”而读书的狭窄与浅薄可比拟。据欧阳修的《归田录》记载:“钱思公(钱惟演谥号文思)虽生长富贵,而少所嗜好。在西洛(宋代西京洛阳,

今河南洛阳)时,尝语僚属言:‘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辞,盖未尝顷刻释卷也。’钱惟演出身富贵之家,平生嗜好不多,惟钟情读书,他的理由是:‘学士备顾问,不可不读。’要当好皇帝的参谋,学问不能不渊博,因此,他坐着时读史书,躺着时读先秦百家和历代杂记,连蹲在厕所里都要吟诵几首小令,到了逢书必读、手不释卷的程度。

钱惟演不但爱读书,更爱藏书。他家藏书极富,堪与秘阁即皇家藏书相媲,是历史上有名的藏书家。他曾参与“宋四大书”之一《册府元龟》的编修,为这一史学巨著的完成奠定了基础。钱惟演平生著述较多,著有诗集《典懿集》三十卷,还有《枢庭拥旄前后集》《伊川汉上集》《金坡遗事》等一系列散文随笔。

钱惟演尊重人才,提携后进,曾不遗余力帮助欧阳修、梅尧臣、尹洙等一批青年才俊。他在西京洛阳任使期间,欧阳修是他的部下。一天,欧阳修与同僚畅游嵩山,到达龙门时突然下起了雪,正不知如何是好之际,却发现有人冒着风雪渡过伊水而至,原来是钱惟演派来的厨子和歌伎。钱惟演让厨子和歌伎转告他们,府里公事简便,用不着急忙赶回去,派来厨师和歌伎,为他们赏雪助兴。钱惟演这一无微不至的关心,让欧阳修一行感动不已。如果说,作为领

导,对部下的关心爱护体现了一种责任的话,那么对读书人的惺惺相惜,以培养读书种子为己任,促成读书种子薪火相传,便是一种精神了,难能可贵。所以,不论人们对钱惟演的评价如何,欧阳修一直把钱惟演当成自己的恩师,对其知遇之情毕生不忘。

爱书之人,即使是对书桌上的文具,都爱得痴狂。《归田录》还记载了这样一则趣事:钱惟演有一个珊瑚笔架,素置于案头,十分珍惜。他治家严格,持家节俭,孩子们平时不能多花一分钱。为此,孩子们想出了一个馊主意:“有欲钱者,辄窃而藏之”,没钱花的时候,就把父亲的笔架藏起来。钱惟演发现笔架丢了,心急如焚,无奈之下,“乃榜于家庭,以钱十千贖之”,在家里贴出寻物启事,悬赏十钱(相当于十两银子)找寻笔架。藏笔架的孩子故意拖延两天,然后假装找出来了,把笔架送还他,他“欣然以十千贖之”,如数兑现赏钱。于是,这成了一条生财之道,谁缺钱花,就藏笔架,一年总有那么五七回,孩子们乐此不疲,而且屡试不爽,钱惟演始终没有察觉到这是个“圈套”。说完,欧阳修还信誓旦旦地说:“余官西都,在公幕亲见之。”可见此事千真万确。

钱惟演去世后,朝廷为给他赠谥号争论不休。开始,根据《谥法》“敏而好学曰‘文’,贪而败官曰‘墨’”的规定,拟谥号“文墨”,颇有鄙夷;后来改成“文思”,有所改进;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年),再改为“文僖”,充满尊敬。谥号越改越好,是影响越来越大,地位越来越高的表现,这说明,士大夫渐渐忘却了攀龙附凤的钱惟演,而记住了勤学好学的钱惟演。

爱书如痴,也能名垂青史,这或许是钱惟演当初没有想到的。

拾遗

周恩来:给运动员“敬菜”

1961年4月,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北京举行,我国代表队一举夺得男子团体和男女单打三项冠军。比赛结束后,周恩来在西花厅特意设宴招待他们。

4月21日这天,运动员们整整坐了两大桌,总理安排获得男女单打冠军的庄则栋和邱钟惠坐在他身边。等菜上齐了,总理起身对大家说:“我今天不能向你们敬酒,就敬菜。这几个菜是我特意让厨师做的,是我们淮安的家乡菜。尤其是这盘‘狮子头’最有代表性,也是我最爱吃的菜,我还会做,就是没时间,不然我一定亲自为你们做。”说着把一只“狮子头”用筷子夹成四瓣,把其中一瓣夹到邱钟惠碗里。

《海录》:

中国第一本介绍世界地理历史的著作

谢清高是已知的鸦片战争之前的清代人走得最远、最广,且给后人留下著作的第一人。在他之前,康熙年间樊守义(1682—1735年)曾出西方12年并写成《身见录》一书,但是此书直到1937年才被发现,对近代中国未产生太大影响。谢清高18岁时便随外国商船游历欧洲,其航海生涯大致在1782年到1795年,后因双目失明,只得返回澳门定居。

嘉庆二十五年(1820),谢清高请嘉应举人杨炳南将自己的经历记录整理成《海录》一书。这是中国第一本介绍世界地理、历史和风土人情的著作,全书约25000字,记述了世界上9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情况。欧美部分记载最详的是大西洋(葡萄牙)、荷兰国和英吉利国。正如吕调阳重刻《海录》序文中所说:“中国人著书谈海事,远及大西洋外,自谢清高始。”

“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学者有新注解

历代专家对《木兰辞》都做过很多注释和研究,然而其中的语句仍比较令人费解,比如其中的“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学者史金波通过对西夏军籍文书的研究认为,这里的“军书”应理解成军籍文书。

中国古代对军籍的登记有不同的时间规定,有的每两三年登记一次。汉文史书中并不乏对军籍的记载,但过去未发现过古代的军籍样本,对军籍的具体形式和内容语焉不详。而史金波对西夏军籍文书的发现为解释这句话提供了新的思路。

西夏法律规定,西夏对军人和装备的大型登录、检校是每三年一次。北朝时期实行府兵制,若每三年登记一次军籍,登录十二次的军籍卷册中每册都有木兰父亲的名字。木兰父亲从达到士兵的成年年龄,再经过十二次登录,经过了30多年,年纪应在50开外,已不适于参军作战,又无成年长子,才有了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